

# 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

韩 长 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

韩长经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乐秀镛  
封面题字：袁晓雯

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

韩长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字数 85,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10078·3232 定价：0.41元



## 目 次

---

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关系	[ 1 ]
鲁迅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 49 ]
从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 谈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问题	[ 79 ]
鲁迅与果戈理	[ 113 ]
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	[ 135 ]
鲁迅与契诃夫	[ 158 ]
后记	徐文斗 [ 188 ]

---

## 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关系

俄罗斯古典文学是俄国人民的精神宝库，有着光荣的传统。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对它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俄国先进的作家高举战斗的旗帜，以自己的毕生精力来为人民解放运动服务，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曾发生过强烈的影响。很早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把文学称为“生活的教科书”。这就告诉人们，文学不只是单纯知识的传授，而且是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按照列宁的说法，洋溢着阶级斗争气氛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革命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影响下，曾经有千万个青年为实现小说所表现的思想而斗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列宁于一九〇二年提到“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

义”时说：“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sup>①</sup>。高尔基更是形象地记述过，有一次他和列宁谈话，列宁面前放着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在谈起托尔斯泰时说道：“在欧洲有谁能够同他相提并论呢？”又自己回答自己道：“没有。”于是他搓着两手，满意地笑了起来。<sup>②</sup>斯大林也曾举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的名字，引以为俄罗斯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我们不只在列宁与斯大林的著作里，经常碰到俄罗斯文学中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可看到他们对俄国作家作过多次精辟的专题评论。人所熟知的列宁用果戈理笔下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讥讽孟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果戈理创造的玛尼罗夫，冈察洛夫创造的奥勃洛摩夫等典型，也多次出现在列宁的著作里。列宁对赫尔岑和托尔斯泰所作的经典性分析，更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古典作家的典范。这也正如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

---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② 《列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60页。

两杂志的报告》里所指出的：“在文学领域中，我们党曾从列宁和斯大林口中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伟大俄国革命民主派作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普列汉诺夫的巨大意义。”①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革命传统，被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下来。“五四”以后，我国文艺界介绍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稍后，并由俄罗斯古典文学而及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当时，有的青年往往是受到俄国文学作品的启发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鲁迅很早就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在他刚刚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就于一九〇七年写了启蒙主义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这是中国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论文。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印行了《域外小说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也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54页。

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国作品。之后，他研究译介俄国文学的兴趣，可说是与日俱增。直到逝世前一天，还支撑着久病虚弱的身体，仔细地校阅了自己未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的译文，待作品发表时，他已永离人世了。这个事实说明，介绍俄国文学，在这位文化伟人的辛勤劳动中，占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因此，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几次提到他所受的俄国文学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

勿庸置疑，鲁迅的创作是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因为他吸取外国文学的营养，是把它创造性地熔铸在自己的民族形式里，所以，我们简直找不出这个影响的明显痕迹。“即以驱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鲁迅的文学语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话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语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见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气派，……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sup>①</sup>。因而说他的作品里，既没有别人的因

---

① 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鼓吹续集》作家出版社  
1962年版第210页。

素，也没有所谓异国情调，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另一方面，拜伦等英国的摩罗诗人，波兰以及巴尔干诸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东方的日本文学，对鲁迅的早期创作，都曾有过影响。而在外国文学的多元影响之中，俄国文学给予他的影响，则更为明显。鲁迅自己也说在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sup>①</sup>；“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sup>②</sup>；所看的俄国作家的作品特别多，果戈理、契诃夫等更是他心爱的作家。<sup>③</sup>被称为浪漫主义传奇的《斯巴达之魂》，就是取材于异域；《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虽是翻译，实为改作；《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自然忧愤深广，但所受影响，究竟有线索可寻。他的对于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怀，对于社会的深刻解剖，善于从普通人物身上发掘他们灵魂深处的伟大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小说的布局、结构、驾驭文字的技巧等方面，和契诃夫等俄国作家，也有着某

---

①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②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98页。

③ 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李何林编《鲁迅论·新中国的领袖鲁迅》。

些相近的特征。这又说明鲁迅一向善于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没有这个影响，也很难形成他的独特的风格。

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sup>①</sup>；也认为“排外则易倾向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sup>②</sup>。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热风》等早期著作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批判中国统治阶级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而主张向外国学习。鲁迅当时认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sup>③</sup>“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sup>④</sup>。要创造民族新文艺，必须有敢于接受外来事物的雄伟气魄。生气勃勃的民族，战斗的无产者，有改造一切、扭转乾坤的巨大威力；只有那些即将没落的阶级，才抱残守缺，顾虑重重，不敢接触外来

①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 528 页。

② 《〈新俄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575 页。

③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96—197 页。

④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92 页。

的新鲜事物。

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曾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中国历史上凡是一个封建王朝比较强大，文化昌盛时期，对输入外来文化，很少禁忌，且能够化为已有，使其为自己服务；在国势衰危，统治阶级感到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对外来事物则有说不完的清规戒律，疑神疑鬼，不敢问津。鲁迅指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sup>①</sup> 鲁迅把汉唐盛世和“衰弊陵夷之际”的南宋作了对比后得出结论说：“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

---

<sup>①</sup> 《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页。

么会做出好东西来。”<sup>①</sup> 鲁迅的这些意见，既说明了历史，又针砭了当时；对今天的现实，也是一面明澈的镜子。“四人帮”一伙，正是这样的“孱王”和“孱奴”。他们一方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沉湎于外国黄色电影和毒品中，把鸦片当饭吃；一方面却挥舞着“洋奴”、“买办”等大棒，歇斯底里地叫嚣要“彻底砸掉”、“彻底扫荡”一切外国的古典的文艺作品，即使是那些得到革命导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的作品，都被他们从我们的书店和图书馆里、书架上和课堂里排斥出去。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赞扬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涅，或是列宁所深刻评价过的托尔斯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成了禁忌的、不祥的名字。这种杀气腾腾的架势，其实正好说明了他们是一伙色厉内荏的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说明他们和历代即将灭亡的反动统治者一样，是一群在外来进步事物面前“抖成一团”、怕见阳光的黑暗里的动物。

鲁迅对待外国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而是辩证地看待它们，批判其糟

---

<sup>①</sup> 《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303页。

粕，吸取其精华。他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sup>①</sup>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是辩证地对待外国遗产的典范。拿过来，占有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决定取舍。鲁迅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待西洋文明，“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sup>②</sup>。因此，只要是优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sup>③</sup>他尖锐地提出，只要有正确的评论作指导，青年也可以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开阔眼界，知己知彼。“老子天下第一”的阿 Q 精神是可笑而又可怜的。闭关自守，自我陶醉，只能使自己与世隔绝，落在时代的后面。

在鲁迅生活的三十年代，中外反动派和今天的“四人帮”一样，对于介绍世界名著，进行文

---

① 《“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180 页。

② 《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56 页。

③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63 页。

化交流，怕得要死，凡是可以运输精神食粮的航路，都被他们统统堵塞。鲁迅称他们是“聋哑的制造者”，“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sup>①</sup>鲁迅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话，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它达到了历史主义的高度，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

由此可知，鲁迅对接受外国文学遗产，始终有其明确的标准，从不主张无批判地继承，也反对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复古派的国粹论，欧化派的移植论，固然和鲁迅格格不入，拒绝接受遗产的“孱头”，对遗产抱虚无主义态度的“混蛋”和无批判地继承的“废物”，都曾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这种提倡有主见有选择地接受外国文学遗产的正确立场，决定了他的翻译工作有一个突出的倾向，便是他特别喜欢选择为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叫喊和反抗的作品。这样，从早期的《域外小说集》到逝世前的《死魂灵》，俄国文学始终成为他翻译评介的对象，便不是偶然的了。他爱好旧俄作家深沉的反抗和无情的

<sup>①</sup> 《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5卷第221页。

暴露，他看到俄国文学是叫喊和反抗的，是被压迫者的辛酸、挣扎、呻吟、穷困的反映。它真实地反映了革命人民觉醒前痛苦的“哀音”和觉醒后“要反抗，要复仇”的“怒吼”。他特别努力介绍俄国文学的目的，“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而正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sup>①</sup>。

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还在向西方学习，很少人想学俄国的时候，鲁迅就指出：“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sup>②</sup>深信俄国人民的潜在力量，并看到“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精神，能“疾进无所沮核”。俄国文学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即“日益昭明”，“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sup>③</sup>这是一个先觉者对俄国文学的预见。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

---

① 《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321页。

②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95—196页。

③ 同上书，第220页。

“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sup>①</sup>这时候，鲁迅对俄罗斯人民，更表示了他的敬意，认为“‘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sup>②</sup>并断言广大的中国读者，在朦胧中早就知道这肥沃的“黑土”里，会生长出累累的文艺硕果。这使鲁迅不顾反动统治者的血腥迫害，冒着生命的危险，更加坚定不移地去探索俄国文学，打通了俄国文学输入中国的“航路”。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鲁迅能够把俄国人民与俄国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他尊敬俄国人民，热爱俄罗斯文学，但他对残暴的沙皇统治集团却极为憎恨。他在俄国文学中见到“朋友”，吸取到革命力量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贪婪的

---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② 参看《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记》。另在《鱼的悲哀·译后附记》里说：“至于‘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精神。”

沙皇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这种鲜明的爱憎，贯串于鲁迅一生的言行里。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青年爱国者的鲁迅，就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俄运动。一九〇三年四月，我国留日学生，为响应祖国人民声讨沙皇霸占中国东北大片神圣领土而展开了“抗俄运动”，在东京成立“拒俄义勇队”，并写信给清政府，要求上前线与俄国侵略军作战。这封信发表于同年《浙江潮》第四期，接着在第五期上，就出现了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可见这篇歌颂古希腊斯巴达人不畏强暴、浴血抗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的小说，正是当时这个抗俄运动的产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刚健不挠”、“争天抗俗”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其中“死在哥萨克兵矛尖上”的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裴多菲，波兰人民抗俄斗争时期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特别得到他的赞扬和钦佩，说读他们的作品，令人“心神俱旺”。对这些诗人，鲁迅后来还多次称道和推崇，就是因为他们是抵抗沙俄的爱国者。比如裴多菲，鲁迅在许多文章中提到他，还翻译过他的诗和介绍他的专题文章，认为“他的诗至